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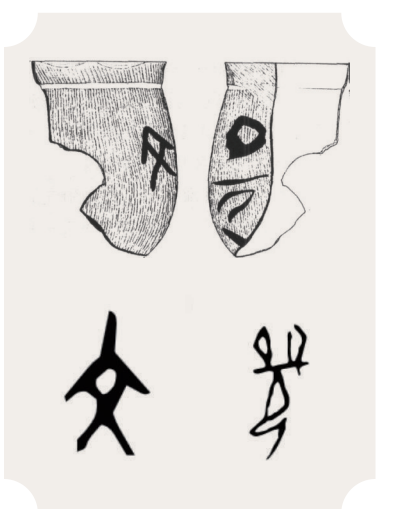
用古文字讲好中华文明

□ 代 生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 3000 多年，3000 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这表明，我们要高度重视汉字研究，通过深入了解汉字、传承汉字，来发挥汉字的文化纽带和文化遗产价值。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在国际公认的文明社会标准中，文字是一项重要标志。我们熟知的甲骨文是成系统的中国文字，代表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高峰，而在此之前，中国文字已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从诸多的田野考古发现中，能够寻绎出中国文字起源的大量线索，如距今 8000 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葬中龟甲上面的刻画符号和多件骨笛等，代表了先民的认知水平和音乐技艺，成为文明起源的重要体现。距今 5000 多年的大汶口遗址陶缸和良渚文化陶器上的不少刻画符号相同或近似，体现了南北两大文化的密切交流，其文字意义更是十分明显。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扁壶上的“文”“尧”二字清晰可见，其观象台遗址与《尚书·尧典》所载密切相关，种种迹象表明该遗址与尧都平阳有关；文字与考古遗址的密切结合，也印证了五帝时代的真实存在。另外，该遗址发现的骨相上有一个刻划符号，是农具的形象字，明显是甲骨文“辰”字的前身，体现了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字有着较早的起源，并成为中华文明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体现。



山西陶寺遗址的“文”“尧”（尧）二字与甲骨文“文”“尧”

西方学者曾以没有文字而质疑夏王朝的存在，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年的探索，考古学家提出“以王城岗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是夏代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的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而根据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蔡哲茂的研究，甲骨文、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的“西邑”就是夏；同时，甲骨、青铜铭文中的“纪”“杞侯”等夏人后裔在商代的继封也充分说明夏王朝的真实性。甲骨文资料成为论证夏王朝确不可疑证据链中的重要一环。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深刻总结

古人创造文字，已经将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字形之中，字义的扩展与演变也深刻体现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如甲骨文的“中”字（𠄎），其形既像圭尺，又似旗帜，主持陶寺遗址发掘的何弩先生和古文字学家冯时先生认为这是陶寺遗址的圭尺之形，与古代的天文历法有关，并孕育出居中、中和的思想。也有不少专家强调“中”就是旗帜与倒影垂直一线，时间为中午、正午，又引申为不偏不倚，公正公平，认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庸思想的来源。两种说法可谓异曲同工，据清华简《保训》篇所载，“中”是测阴阳之物，由尧舜而传至商族先公上甲微，而后传至周文武二王，显然是由一种物件（圭尺或旗帜）演变成为一种思想和理念（中和、中庸），这其实就是“中”字本义及涵义演变的意蕴，《论语·尧曰》记载尧命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两者信息完全一致。“中”的思想经尧舜时代传至西周以至春秋，孔子将之发展为“中庸”思想，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这一思想延续几千年而影响中华民族至今。

又如“老”和“孝”字，“老”字之形是一长发驼背老者手拄拐棍（𠄎），其刻画的老者形象栩栩如生；而“孝”字则是老者手中无拐，一“子”搀扶老人的形象（𠄎），比喻侍奉父母，故而《说文解字》说“孝，善事父母者”。何为老？何为孝？其义一望而知，尽心侍奉父母就是孝。此类字例众多，不胜枚举，可以看出，汉字由初造到使用，由本义到引申义，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凝聚了先人的智慧。

文字体系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

甲骨、金文、战国文字等古文字随着商周王朝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得到推广使用，并成为融通中原、华夏与少数民族的重要因素，它们还起到了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作用。

甲骨文主要为王和贵族使用，商周时代虽然传播不广，但西至陕西，东至山东已有甲骨的发现；而且集中在殷墟的大量龟甲来源是多方面的，有花龟、金龟、水龟和亚洲大陆龟等种类，亚洲大陆龟分布区域主要是东南亚和马来半岛，目前所知至少已有 15 万片，虽然不是整版龟甲，但巨大的使用量，如果没有超强的号召力，是难以获得这么多来自不同区域的龟甲的。

西周通过分封诸侯、分封器物等措施，使得周边族群对金文的认识更加深入，一些非周族群有意识地保存、仿制商周王朝的青铜器，铸造铭文，积极融入“早期汉字文化圈”。如自称“蛮夷”的楚人，很早就铸造铜器并铭功颂德，春秋时代他们还采用《诗》《礼》《乐》等文献教育太子及贵族子弟，从已公布的楚简资料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已经与北方的稷下学宫相媲美，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早于孔子的吴国公子季札来中原礼聘，“请观于周乐”，对《诗经》的“风”“雅”“颂”各篇都进行了精准的评价，并能够发挥诗志，结合列国历史陈述兴衰败亡，表现出他对周代礼乐文化的熟谙，体现了边裔文化积极主动向华夏文明靠拢的态度。

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文字，虽经时代变迁、使用主体改变，书写载体也发生变化，但字形结构没有大的变化，这体现了文化的一脉相承，这一时代形成的文字体系以及生成民族元典，成为边裔族群从文化认同到身份认同的重要一环。秦王朝为维护统治，实行“书同文”的政策，本世纪初发现的湖南里耶秦简中，有字高达 17000 多枚，大都是中央对地方管理的规定，反映了秦王朝对边远郡县的有力统治，体现了由文字统一到政令一统的“治国智慧”。边远地区以及边疆民族对汉字的认同和使用，也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局面的形成。

汉字、汉籍与东亚文明共同体

秦汉以后，中华文明进入成熟文

明阶段，以汉字和经典为代表的文化内涵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生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每入主中原，要么积极变革、学习汉字汉籍以融入华夏，要么固守传统而最终退出中原。不仅如此，儒家文化在历史上还对东亚甚至亚洲其他地区的各民族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形成了庞大的“儒家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形成，首先就是从文字开始的。如从地缘上来看，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属于东亚，从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更重要的是，汉字曾经在这些国家作为主要的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来使用，在汉字的基础上，日韩等国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但是汉字一直在使用，这就是东亚文字文化圈。目前日本文字中保留 2000 多个常用汉字，他们还每年举行“日本汉字能力检定”的汉字能力考试。可以说，汉字、汉籍促成了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在今天，它们也成为建构亚洲文明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基础。

古代中国的文字、民族经典因友好交流而传播海外，它们给亚洲乃至世界文化带来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深刻影响了异域文化，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许多文化典籍已经散佚不存。今天，我们搜集整理散落世界各地的域外汉籍，成为研究汉文化圈、寻找部分“失落”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文字符号、文字孳乳到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以至隶书、楷书等发展而来的中国文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表意文字，中华文明虽历经坎坷而未曾中断并能辉煌灿烂如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基因没有中断；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它们正是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因此，无论是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民族精神的建构，抑或把握当下，创造未来，都必须了解汉字文化，重视文字研究，充分把握中华文明的根和脉。



（上接 1 版）

力量支撑：双城联动

目标引领发展，理想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要“率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的两大中心城市，广州、深圳各有特色，相得益彰，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深圳是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广州和深圳必须以共同之理想凝聚共同之力量，以共同之奋斗实现共同之目标，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基础强、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通过双城联动强强联手、优势互补，聚焦强化整体效应、集聚效应、协同效应、战略效应和辐射引领带动效应，全方位推动产业、科技、教育、医疗、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对接协作，不断加强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以高水平“双城联动、比翼双飞”推进“双区”高质量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空间支撑：综合改革

全会要求，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深圳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强，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历程。40 年的发展历程深刻启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如今的深圳，肩负着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历史使命，需要以更大的改革空间支撑更广阔发展空间的开拓。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 27 条改革举措和 40 条首批授权事项。”不久前，《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对外公布，赋予了深圳更多的改革自主权、更大的改革创新空间，使深圳再一次承担起改革“先锋队”的角色，赋予了经济特区的“特”的新时代内涵。深圳经济特区要扛起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着眼于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着眼

于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多策划战略战役性改革，多推动创造型、引领型改革，提高改革综合效能，努力在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

动力支撑：创新驱动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经济特区率先走出一条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既有充分条件，更有时代的紧迫性，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提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挥深圳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引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构建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提升发展能级和竞争力。

信念支撑：特区精神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印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40 年砥砺前行，经济特区凭借着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担当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路先锋的重任，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事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特区要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改革开放的实干家，更加需要以全面、辩证和长远的眼光认清大势，坚定舍我其谁的信念、勇当尖兵的决心，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系广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主任】

雅尔塔会议具有两重性

雅尔塔会议是反法西斯大同盟合作的顶峰。雅尔塔会议巩固和维护了美英苏三国战时联盟，协调了盟国对德日法西斯的作战部署，加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团结，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加强协调，共同解决世界面临难题的合作精神，值得肯定。

雅尔塔会议本身也具有大国强权政治和大国霸权的色彩，反映了大国的民族利己主义。击败德日法西斯后，三国也在划分势力范围，并出现了许多矛盾与分歧，导致反法西斯大同盟发生分裂，美苏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雅尔塔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战后国际新秩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同，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正义性，《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人民主权、民族自决与和平解决争端、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等原则，被其成员国普遍接受，促成了殖民体系的崩溃，使世界的发展更加公正与合理。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和联合国机制，对调节国家间的矛盾、制止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二战后没再发生过世界大战，与此不无关系。

二战与国际秩序

雅尔塔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在德国法西斯濒临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背景下，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在雅尔塔举行了美英苏三国领导人会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大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雅尔塔会议不仅研究了反法西斯大同盟协调合作彻底战胜法西斯的问题，还讨论了战后国际与地区秩序的安排问题。由于雅尔塔会议为战后国际秩序作出了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战后国际秩序也因此被称为雅尔塔体系。

协调对德国日本的作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红军成为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不仅把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赶出了自己的国家，还解放了被德国侵略的其他国家，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与苏联国际地位提升相对应的，则是大英帝国风光不再，军事和战略决定权已经转到了斯大林和罗斯福手中。

欧洲战争即将结束，苏联红军和盟军分别从东西两侧开始向德国本土进攻。按照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战略，协调下一步对日作战的问题是重点。苏联红军在抗击德军中显示了自己的威力，罗斯福希望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罗斯福和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举行会谈，斯大林告诉罗斯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有条件的，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就很难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要去同日本作战，因为日本并未入侵苏联。罗斯福满足了斯大

林的要求。1945 年 2 月 11 日，斯大林和罗斯福邀请丘吉尔共同签署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协定》。

在欧洲秩序安排上的博弈与妥协

德国问题是雅尔塔会议上最为突出的问题。三国首脑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确定了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一般原则，以及对德国分区占领的原则。在德国武装抵抗最后被击溃后，三国将共同使纳粹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款，美英苏三国军队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解散德国一切武装力量及其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一切军事装备，拆除或管理其全部军事工业，惩办战犯，消灭纳粹党及其制度，消除纳粹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确保德国不能再扰乱世界的和平。在德国赔偿问题上，苏联与英美两国领导人分歧严重，斯大林的目标是尽量削弱德国，并使德国在 10 年内向战胜国赔偿 200 亿美元，其中一半给苏联。美英两国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训和保持

影响深远的雅尔塔会议

□ 左凤荣

德国生存的需要，虽然原则上不反对德国支付实物赔偿，但反对规定具体赔偿数额。这一问题未能达成协议，决定将此交由在莫斯科设立的赔偿委员会处理。

三国首脑争论最激烈的是波兰问题。在波兰领土问题上，斯大林要求承认苏联对波兰东部领土的吞并，以“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并提出用德国的领土在西部给予波兰补偿。美英首脑同意按斯大林的方案解决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但波兰西部疆界问题留待和会解决。“三巨头”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美英承认的是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斯大林承认的是苏联扶植的卢布林委员会。罗斯福建议由波兰精英组成一个总统委员会，来承担组建临时政府的任务。英国因波兰问题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需要捍卫大英帝国的荣誉，他关心的是波兰的主权、自由和独立问题。但斯大林表示，在整个历史上，波兰一直是敌人入侵俄国的走廊，波兰是关系到俄国生死存亡的问题。由于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王牌自然在苏联手中，最后

“三巨头”达成协议，以苏联承认的卢布林委员会为基础进行改组，容纳波兰国内外其他民主人士，该政府应“尽速根据普遍选举与秘密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

根据罗斯福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该宣言强调，欧洲秩序的确立，以及国民经济生活的再建，必须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并创造自己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实现；三国政府认为必须协助被解放欧洲国家创造国内和平条件，成立民主临时政府，尽快进行自由选举等。该宣言体现了《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的原则，表明三大国要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秩序以保障欧洲的和平与安全。

确立战后国际秩序

战后国际秩序安排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重心。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组织，建立起永久和平机制，防止战争的悲剧重演，是会议关注的主要问题。雅尔塔会议就有关联合国的分歧